

论人民币汇率下调对我国贸易收支的影响

The Impact of Depreciation of RMB on Foreign Trade

张宇贤

(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

汇率是影响一个国家进出口商品价格的重要因素,汇率调整常常成为一国调节贸易收支的重要杠杆。80年代以来,为了改善对外贸易收支状况,我国曾多次对人民币的官方汇率实行下调。其中比较突出的几次是:1985年,人民币对美元的比价首先由1981~1984年的1美元:1.5元调整为1美元:2.8元,下调幅度达86.7%,其后又逐步调整为1美元:3.2元,下调幅度为14.3%;1986年7月,人民币汇率再次由1美元:3.2元下调为1美元:3.72元,下调幅度为15.8%;1989年12月和1990年11月又两次下调,由原来的1美元:3.72元下调至1美元:4.7元和1美元:5.2元,下调幅度分别为26.3%和9.57%。

人民币汇率下调无疑是要改变我国人民币币值的对外高估状况,从而达到扩大出口,限制进口,改善贸易收支的目的。然而,实际效果如何?本文试图从理论上和实践上作一分析。

一、影响汇率调节作用的诸因素 ——对汇率调节贸易收支的一般分析

民、美国科学家同行怀着十分友好的情感,他出于什么考虑此生此世再也不踏上美国的国土呢?钱学森1985年3月9日给我国国务院一位领导同志的信对此作了十分坦白的回答:“我本人不宜去美国……事实是我如现在去美国,将‘证实’了许多完全错误的东西,这不是我应该做的事。例如,我不是美国政府逼我回祖国的;早在1935年离开祖国以前,我就向上海交大同学、地下党员戴中孚同志保证学成回到祖国服务。我决定回国是我自己的事,从1949年就作了准备布置……我认为这是大是大非问题,我不能沉默。历史不容歪曲。”钱学森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的品格,正是江泽民总书

汇率能否起到调节贸易收支的作用,西方流行的衡量标准是马歇尔—勒纳条件,即当一个国家对外实行货币贬值时,只要该国的进出口商品需求价格弹性值之和大于1,将有利于该国贸易收支的改善;相反,当一个国家对外实行货币升值时,如果该国的进出口商品需求价格弹性值之和大于1,将恶化该国的贸易收支。马歇尔—勒纳条件是根据贸易收支与进出口商品数量、进出口商品价格之间的关系推导出来的,其本身无疑是正确的。然而,马歇尔—勒纳条件的结论是否总是与现实经济生活中的情形相一致呢?我们认为,未必尽然,因为在实际生活中影响和制约汇率调节作用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并非只有进出口商品的需求价格弹性。

第一,转嫁率的高低。转嫁率是指汇率变动部分转嫁到进出口商品价格中去的多少。它直接影响着进出口商品价格的变动幅度,从而也就影响着进出口商品数量变化的大小。如以货币贬值国为例,转嫁率越高,货币贬值所引起的以外币表示的该国出口商品价格下降幅度就越大,从而在国

记称赞他所具有的“高度的民族自尊心、民族自信心和民族气节”。

钱学森说过:“我作为一名中国的科技工作者,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如果人民最后对我的一生所做的工作表示满意的话,那才是最高的奖赏。”“一切成就归于党,归于集体”就导弹航天技术方面来说,他早在1982年就说过:“中国航天事业的成就是全国人民支持、千万人辛勤劳动、党和国家领导的结果,我个人不过适逢其会,做了一点点事;自己想来,也很内疚,因为做得太少了。”

(转载自1991年10月28日《人民日报》)

际市场的价格竞争能力就越强,出口增加也就会较多;同时,它又将引起以本币表示的进口商品价格大幅度上升,国内需求随之会受到较大的抑制,进口商品数量减少较多。正是通过这种较大的进出口数量的调整,该国的贸易收支便可得到较大幅度的改善。反之,转嫁率很低,则贸易收支的改善会受到很大的制约。

转嫁率的高低与当时国际市场的价格水平密切相关。例如,当一个国家货币升值时,如果该国的出口商品在国际市场上价格看涨,其转嫁率就会高些,因为它不会太多地影响到该国商品的国际竞争能力,反之亦然。

第二,进出口商品需求价格弹性的大小。一国汇率变动时,其进出口商品的需求价格弹性受制于三个因素:其一,被该国的经济结构所决定的该国进出口商品结构。经验证明,在一般情况下,制成品需求价格弹性较大,而初级产品需求价格弹性较小。其二,该国进出口商品所采取的竞争手段,即主要是通过价格竞争取胜,还是通过非价格竞争(如质量)取胜,或者是二者兼备。竞争手段对进出口商品需求弹性的影响,可以根据国家的不同而写出不同的组合,从而会得到不同的弹性系列。其三,与该国出口商品结构相适应的那些商品的国际价格水平。一种商品需求价格弹性的大小不单与这种商品价格变动(纵向的价格比较)有关,而且也与同类产品的价格水平(横向的价格比较)有关,因为同类产品之间往往存在着一种替代关系,替代程度的大小影响和制约着需求价格弹性的大小。

第三,贸易条件的改变。一个国家的贸易收支状况实际上是由进出口商品数量的变化和贸易条件(出口商品价格比进口商品价格)的变化决定的。如果撇开进出口商品数量的变化,而只看汇率变动对贸易条件的影响,那么贸易条件本身就成为调节贸易收支的一个阻碍因素,因为由汇率变动而引起的贸易条件的改变与贸易收支的调节往往成相反运动:货币升值有利于该国贸易条件的改善,从而将有利于增加单位出口商品的外汇收入,增加贸易顺差;而货币贬值将恶化该国的贸易条件,从而将导致单位出口商品的外汇收入的减少,增加贸易逆差。

第四,商品的国际价格状况。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环境因素,可以说,上述三个因素的大小都要受制于它,因而它对汇率调节作用的制约是显而易见的。

第五,进出口商品供给弹性的大小。汇率变动而引起进出口商品数量的变动还受到进出口商品供给弹性的制约。不难理解,如果一个国家的进出口商品供给弹性很小,甚至完全无弹性,那么即使

其需求弹性再大,也难以达到改善贸易收支的效果。

此外,还不能忽视的一个重要制约因素是,随着70年代以后新贸易保护主义的发展,非关税壁垒已成为贸易保护的主要形式。这种非关税壁垒直接影响着进出口商品的数量,由汇率变动而引起的价格竞争优势的变化对这些商品的调节作用很小。

二、人民币汇率下调的历史检验 ——对1985~1986年下调效果的实证分析

1985~1986年,我国人民币的官方汇率连续大幅度下调,由1美元:1.5元下调至1美元:3.72元,总下调幅度达148%。效果如何?

在1984年人民币汇率大幅度调整前,我国的出口商品总额为261.4亿美元,进口商品总额为274.1亿美元,贸易逆差为13亿美元。1985~1986年人民币汇率调整后,我国的出口商品总额这两年分别为273.5亿美元和309.4亿美元,比上年增长了4.6%和13.1%;进口商品总额分别为422.5亿美元和429.1亿美元,比上年增长了54.1%和1.6%。年贸易逆差额分别高达149亿美元和120亿美元。1987年,由于出口商品总额进一步增长(出口额达394.4亿美元,比1986年增长了27.5%)和进口商品总额的相对停滞(进口额为432.1亿美元,仅比1986年增长了0.7%),贸易逆差较1985年和1986年大大减少,只为37.7亿美元。但到1988年,却又扩大到77.1亿美元(出口额为475.4亿美元,比1987年增长了20.5%;进口额为552.5亿美元,比1987年增长了27.9%)。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这两年已大大减少了的贸易逆差额,却仍然远远高于1984年即汇率调整前的水平。这说明,人民币汇率大幅度调整后,我国的贸易收支状况并没有出现令人满意的变化,相反,贸易逆差却在汇率调整后爬上了一个新的台阶。究其原因,主要在于:

第一,我国进口商品缺乏弹性,因此很难通过人民币汇率下调来限制进口。在我国进口商品中,绝大部分是经济建设所必需的物资和设备。例如,在1985~1988年,我国进口贸易中工业制成品所占比重分别为87.5%、86.8%、84%和81.8%,其中化学品、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机械及运输设备三项之和在工业制成品中所占比重最大,分别为77.2%、73.2%、67.9%、65.6%。1989年,我国进口总额的80%以上是生产资料,其中50%是国内生产所需的原材料,如钢材、矿石、生铁、农药、化肥之类,另一部分则是技术水平较高的机械设备,约占进口总额的35%。这些设备和物资目前是很

难用替代产品来代替的,因此,不论其价格怎样高,进口量不可能有较大的压缩。加之由于下列原因,更使我国的进口贸易呈现刚性特征:其一,我国经济发展主要是靠增加生产投入来取得的,属于外延式的粗放性经营,因此在国内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情况下,经济越发展,就越需要大量进口原料、原材料和生产设备。根据经贸业务统计,1979年我国国民经济对进口的依存度为6.1%,而到1988年上升到10.7%,在1985年和1986年高峰年代,曾高达12.1%。其二,由于产业结构失衡,基础产业的发展严重滞后于加工工业,使我国不得不大量进口工业原料来满足加工工业发展的需要,更从结构上大大强化了我国的进口刚性。1979~1988年,我国工业原料的进口用汇共占进口总值的46.1%,居第一位。其三,近几年来,由于在引进国外生产线方面宏观管理不力,造成了许多盲目进口、重复引进,国产化水平又低,许多产品的关键部件(如彩电的显像管,冰箱的制冷机)和其它零部件必须大量进口。

第二,我国的出口商品也缺乏弹性,因此人民币汇率下调很难促进出口。在我国的出口商品中,80%是初级产品和轻纺织品。1987年,我国出口创汇5亿美元以上的10种大宗商品分别是:原油、服装、畜产品、棉花、成品油、棉布、饲料、抽纱、棉涤布、棉针织品。这种以初级产品和轻纺织品为主的出口商品结构决定了我国出口商品的供给弹性和需求弹性都很小。原因是:其一,我国的原料、原材料等基础产业部门本来发展就比较落后,短时间内产量很难扩大;其二,前几年我国经济增长严重过热,许多出口商品也正是国内经济建设急需的紧缺物资,如煤炭、石油和部分重要的农副产品等,短期内急剧扩大出口,必然加剧国内市场的供求矛盾;其三,在国际市场上,初级产品与制成品相比,本身需求弹性就小;其四,80年代以来,国际市场初级产品价格大幅度下跌;其五,近几年来,西方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盛行,非关税壁垒已成为贸易保护的主要形式,使我国的出口商品,特别是一些主要创汇产品,如服装、棉布等轻纺织品出口受到限制。

第三,在进出口商品弹性不足的情况下,人民币汇率下调造成的贸易条件恶化,抵消了出口增长所带来的好处,而成为制约我国贸易收支改善的决定性因素之一。1980~1987年,尽管我国的出口贸易量增长较快,贸易量指数由100%增加到249.5%,但由于出口贸易条件恶化,出口价格指数从100%下降到76.1%,因此出口贸易额指数仅从100%增加到189.9%。

第四,近几年经济增长速度过猛,供需缺口越拉越大,从根本上制约了人民币汇率调节作用的

发挥。外贸平衡是国内供需平衡的反映。在一般情况下,如果国内需求大于国内供给,则外贸收支趋向逆差。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总供给与总需求的矛盾一直没有解决,供需缺口长期存在。特别是1984年以来,由于经济增长严重过热,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双向膨胀,从而使得供需矛盾更进一步加剧,供需缺口越拉越大。例如,1983年,我国社会商品可供量与社会商品购买力的差额(后者大于前者)还只有56.34亿元,到1984年底则猛增到398亿元,1987年更猛增加到1 321.6亿元。在1984年到1987年的4年中,累计总供求差额为3 000亿元。1987年供求差率为13.6%,而1988年则进一步扩大为16.2%。在这样大的供求环境下,人民币汇率下调不可能对本已严重短缺的我国商品起到促进出口的作用,也不可能对作为弥补我国巨大供需缺口的重要手段之一的进口起到强有力的抑制作用。

第五,企业对汇率变动信号反应迟钝,微观经营机制不健全,影响了人民币汇率下调的刺激作用。汇率变动对贸易收支的调节作用最终将受制于企业对汇率变动信号的反应快慢和反应程度。在目前我国的经济环境下,企业对汇率变动信号的反应迟钝。主要是因为:其一,我国是以计划为主的经济管理体制,行政力量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很大,甚至是决定性的。进出口贸易是对国民经济计划缺口的补充,对外贸易统制又使进出口贸易盈亏与国家财政直接联系起来,因此外贸单位和出口企业主要是按照行政命令组织经营。其二,目前相当一部分出口商品由国家统一作价和统负盈亏,生产厂家接受的是带有补贴的国家价格,而决定出口企业盈利水平的则不光是汇率的高低,而是官方汇率、外汇留成、补贴、奖励等组成的综合收益。其三,我国市场体系还很不完善,贸易和生产很难灵敏地适应汇率变化。多数生产企业和国际市场之间还存在着出口收购制这一隔层,生产企业并不面对国际市场和汇率。

三、喜忧参半——对近两次人民币汇率下调效果的基本估计及今后的对策建议

1989年12月开始的新两轮人民币汇率下调的效果又将如何?我们的基本估计是:它会好于1985~1986年人民币汇率下调时的效果,但又不会使我国的贸易收支状况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之所以说效果会比1985~1986年下调时好,是因为自1988年以来,我国的治理整顿已初见成效,国内的宏观经济环境明显好转,许多因素都有利于人民币汇率调节作用的发挥。具体表现在:

第一,1988年以后,我国的经济过热现象大

大降温,经济增长速度与前几年相比有了明显的下降,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矛盾大大缓和。加之产业结构的调整,加上工业的过快增长受到抑制,因此大大减轻了经济增长对进口的“引力”。

第二,自1989年开始出现的市场疲软现象无疑是目前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一大新的矛盾,但它对优化我国的进出口环境却不无好处。主要是因为:其一,生产资料 and 消费资料销售疲软,一方面可以减少部分生产资料 and 消费资料的进口,从而减轻对进口的“压力”,另一方面又可以部分地缓和我国商品内销和外销的矛盾,促进出口。其二,国内市场疲软,销售不旺,必然大地增加企业的生存压力,从而迫使企业在尽力开拓国内市场的同时,也把眼光投向国际市场,努力扩大产品出口。

第三,随着财政、金融双紧方针的实行,通货膨胀势头得到了遏止,物价上涨率有所降低。1989年我国物价总水平比1988年上升了17.8%,略低于1988年的18.5%,而且1990年的零售物价上涨率已降低到2%左右。这无疑将减少物价上涨对人民币汇率下调的抵消作用,从而延长汇率下调对贸易收支调节的作用时间。

之所以说这两次人民币汇率下调不会使我国的贸易收支状况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主要原因是:

第一,与1985~1986年相比,许多不利于汇率调节作用发挥的经济因素依然存在。如出口商品的供给弹性和需求弹性以及进口商品的需求弹性仍然较小,贸易条件仍然对我国不利等。

第二,我国的宏观经济环境还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好转,供需缺口仍然较大,物价增长速度虽然有所减缓,但仍然较高,通货膨胀依然存在。这样必将不断地抵消人民币汇率下调对进出口商品价格的影响,从而造成人民币汇率的复归。

第三,我国贸易收支状况的长期好转从根本上讲有赖于产业结构的优化,有赖于进出口商品结构的优化,有赖于产业技术的进步和商品质量的提高。而人民币汇率的变动充其量只能在短期内对我国的贸易收支状况发生一定的影响。

至于今后怎样才能尽可能地充分利用人民币汇率下调的有限调节作用,我们提出下列建议:

第一,汇率下调必须与国内的货币和财政“双

紧”方针相结合。汇率下调要真正做到行之有效,贬值必须导致实际汇率的下降。换句话说,贬值必须足以消除国内与世界通货膨胀率之差,而绝不能带来抵消性的国内工资和物价的上涨。因此,在实行人民币汇率下调时,必须采取与之相适应的财政和货币紧缩政策,控制和降低国内的通货膨胀水平。

第二,汇率下调必须与其它贸易政策相结合。人民币汇率下调是通过综合改变进出口商品的比价关系,来达到“奖出限入”,改善贸易收支的目的。由于它本身具有很多局限性,例如,它不能起到优化进出口商品结构的作用,具有促进通货膨胀的不良效果等。因此,在实行人民币汇率下调时,应辅之以其它的贸易政策,如关税政策、配额政策等,使应该促进的特定产品的出口得到更多保护和鼓舞,而应该抑制的特定产品(非必需品)的进口受到更严格的管理和限制,从而达到既优化进出口商品结构、改善贸易收支,又减少单纯的汇率调整所带来的通货膨胀效应的目的。

第三,在汇率下调方式上,应改“普调”为“结构性下调”。过去实行人民币汇率下调时,采取的往往是“普调”方式,即由中国银行规定总的下调幅度。如前所述,这种下调方式如果有所作用的话,那也只是解决了进出口贸易的总量问题。在没有其它配套性的贸易政策的情况下,它对进出口商品结构的优化毫无作用或作用甚小。例如,在“奖出”上,它对国内供给弹性不同、供求状况不同、竞争优势不同和国际市场需求弹性不同的商品,不能区别对待;在“限入”上,它对国内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必需的商品进口和对国内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并非必需的商品,也不能有所差别。因此,今后人民币的汇率下调,应采取“结构性下调”方式,对上述不同商品实行不同幅度的下调。从而充分发挥“汇率”这一重要的经济杠杆的调节作用,达到既能改善贸易收支,解决总量失衡问题,又能优化进出口商品结构的双重目的。当然,“结构性下调”也存在一些弊端,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它会给我国向“单一汇率制”的过渡带来麻烦;其二,具体操作较之“普调”方式更为复杂。因此,需要认真研究。

(责任编辑 肖庆山)